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大 / 师 / 精 / 粹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 卡尔·曼海姆精粹

原著 [德]卡尔·曼海姆

翻译 徐 彬

*Karl Mannheim*

南京大学出版社

PDG

当代学术镜译丛

/ 大 / 师 / 精 / 粹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 卡尔·曼海姆精粹

原著 [德]卡尔·曼海姆

翻译 徐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曼海姆精粹/(德)曼海姆著;徐彬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3804-0

I. 卡... II. ①曼... ②徐... III. ①曼海姆,  
K. 一文集 ②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379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卡尔·曼海姆精粹  
原 著 者 [德]卡尔·曼海姆  
译 者 徐 彬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 都 印 刷 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2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305-03804-0/B·277  
定 价 22.5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数字图书馆  
PDG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中译本序

## A. P. 西蒙斯(A. P. Simonds)\*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本书中的论文得以在中国南京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它足以证明文章作者,一位匈牙利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所作的研究。卡尔·曼海姆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aneinandergeraten*)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它所能保证的只是某类幻想的终结。因此,曼海姆继续认为,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民族与民族相遇,由阶级、地位或职业所界定的个体与该群体中其他成员相遇时,就没有人还能轻易地保持“自足、自满的想当然状态”。〔1〕

\* 本序是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Boston)的曼海姆研究专家 A. P. 西蒙斯(A. P. Simonds)教授应本书中译者之邀,专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在此,译者对西蒙斯教授表示衷心感谢!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他有关曼海姆的专著 *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 *Ideologie und Utopie* (Frankfurt, 1969), pp. 239 - 240, 英文版(London, 1936), p. 279 - 280。英文版将“*aneinandergeraten*”译为“merging into(融合)”,而不是更精确的“coming to grips with(直面)”,这就抹去了该词中隐含的相互对立的视角间的冲突。

曼海姆将沟通互动的扩展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的和独有的特征,这一趋势的意义已超出了“地球村”的前景或“信息爆炸”的挑战的范围。群体之间的相互分离孕育了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我们想当然地接受某些预设前提、基本假设而不经质疑,是因为这些假设的本质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正是我们说“想当然”的意义所在)。只有当沟通跨越了拥有迥然不同的视角的群体边界时,意识形态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才通常被用来表示思想与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其实,这种联系表示的是否定的意义:我们认为其他群体的成员不能把握真理,而真理却对我们表露无疑,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其社会位置和利益的局限,于是,我们在确定这种位置和揭露这些利益时相信我们已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但意识形态的“揭露”是所有群体都能玩的一种游戏。因此,当跨越边界的沟通司空见惯时(这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公共话语就受到冲击,并蜕变成为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曼海姆认为这一状况的特点并非相互支配,而是“相互对话”(talking past one another)。〔1〕在此世界中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向虚无主义投降,使真理屈从于权力;或是进一步采用意识形态概念,不仅用诸某种思想,而且用诸思想的整体结构;不仅用诸对手的视角,也用诸所有的视角——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内。后者就是曼海姆理解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的理路。〔2〕

上文所引述的话出自一篇名为《知识社会学》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曼海姆为一本1931年在德国出版的社会学辞典所撰写的条目。〔3〕两年前,他曾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

〔1〕 前引书。

〔2〕 *Ideologie und Utopie* (Frankfurt, 1969), pp. 69 ff.。

〔3〕 即阿尔弗雷德·维尔康德(Alfred Vierkandt)主编的《社会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Enke, Stuttgart, 1931)。——译者注

ogie und Utopie) 为名将三篇论文结集出版,而在 1936 年该书英译本出版时,加进了《知识社会学》一文以及一篇专为英译本撰写的导论,从而扩充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该书也从此获得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经典的地位,也使得曼海姆个人的地位得以巩固。<sup>[1]</sup> 上述关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特征和环境的叙述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本书中收集的论文的意义。

与大多数现代欧洲社会科学经典不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并非一本体系十分严谨的著作。在此书中,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未得到全面和确定的论述,读者看到的是对历史细节和概念差异的敏感,并且论述几乎是以假设性的方式展开的,他似乎常常在问:“如果通过此方法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什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是否会更有收获?”于是,他不断地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从一个描述性范畴转向另一范畴,从一种追问的风格转向另一种风格,但这些视角最终会殊途同归。阅读曼海姆有点像跟随一位导游去游玩,他不断向你介绍同一景观:我们先在群山之巅一览众山小,而后又徒步翻山越岭。在晨曦微明时,在黄昏薄雾里,在烈

[1] 当 1952 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文第三版出版时,也加进了上述两篇文章,大多数语种的译文,包括法语、葡萄牙语和汉语,都以英文版为蓝本译成,尽管英文版与德文版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所分歧——我们在第一段中已提及一例。尽管曼海姆也参与和许可了德英两种版本的互译,但麻烦之处在于,他本人对英文版并不满意,但他同时也不甚擅长迎合盎格鲁-萨克森阅听人的趣味。关于此问题参见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为 *From Karl Mannheim* (New York, 1971) 撰写的导论,第 lxi-lxxii 页;科林·洛德(Colin Loader)的《卡尔·曼海姆的思想发展》(*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nnheim*, Cambridge, 1985) 第 127 页、第 230 页注解 9;戴维·凯特勒(David Kettler)和沃克尔·梅耶(Volker Meja)的《卡尔·曼海姆与自由主义的危机》(*Karl Mannheim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London, 1995) 第 213-216 页。



日当头下,在空濛烟雨中,他让我们随时随地密切注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有这些体验都是完整的,但每一种体验又试图扩展自己,纠正其他体验。因此,没有一种体验是“确定的”。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的几个章节最初是几篇各自独立的论文,它们有着不同的目标,作者也从未想过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整体或解决几篇论文间的矛盾(即使在1936年的修订版中也是如此)。曼海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将他的方法称为“论文式的-实验性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发展一种“新的思考事物的方式”。<sup>[1]</sup>结果,读者在阅读中也就被一种自我反思的计划所吸引,更多地将思想视为活生生的经验的工具,而不是等待人们去“发现”的固定存在。尽管有批评认为这种方法是在逃避问题,但此方法却很适合于严肃研究“一般”意识形态概念的自我指涉的含义,同时这种研究也并非赋予自身以特权,从而得以从此方法中豁免。这种“论文式的-实验性的”方式激发了读者,从而带着知性上的兴奋和愉悦去阅读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另一点值得人们牢记,即这些论文产生的时间:它们产生于一个极具原创性和创作能力的时代,这一时代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终结了。曼海姆的生活以政治流亡为标志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生活,即匈牙利时期的顶点是他在1919年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大学教授,但好景不长,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德国。在弗赖堡、海德堡、最后在法兰克福(1929年他成为该校社会学教授),曼海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些探索后来就代表了他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成就。但德国魏玛政府的崩溃也意味着他的学术

[1]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52页,以及《重建时代的人和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1940)第32-33页的类似观点。

职位的崩溃,于是他在1933年流亡英国。虽然他新建立的学术声望使他能得到相对合理的地位,但曼海姆从未将他的知性倾向与英美社会科学专业环境完全融合在一起。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取悦于新的阅听人的明显倾向,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计划、公共政策和战后重建上去。1947年,他在伦敦去世,终年53岁。

由于上述背景,本书收集的论文可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补充,因为它们是同时写就的。本书中的论文也是以“论文式的-实验性的”方法写作的,研究的是相近的、有时有点重合的问题。导致相互冲突立场的“问题的位系(constellation)”,这一位系也产生了相互的揭露,进而也为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在自我欺骗的绝对主义和自我毁灭的相对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一种小心翼翼的历史学的尝试,即将思想模式与独特的社会位置和代际更替联系起来;实现视角“综合”的可能性和方式;知识分子独特的“漂移的”社会位置使其能更自由地在各种立场间游离,因此也获得了相对较大的自由度。所有这些主题和其他很多主题对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这些论文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作为文化现象的竞争》在此文集中处于中心地位,该论文在1928年德国社会学大会上首次宣读,引起巨大争议,并且因为这篇论文的影响,曼海姆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任命,同时也为次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代问题》一文发表于《竞争》一文之前几个月,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关于此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研究”。〔1〕而《知识社会学问题》和

〔1〕 简·皮尔彻(Jane Pilcher):《曼海姆对代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一项被低估的遗产》(‘Mannheim’s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An Undervalued Legac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5:3, p. 481)。

他在法兰克福的最后岁月写就的关于精神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的手稿，<sup>[1]</sup>则勾勒了他的思想发展整个过程的特征：富于活力、极具创造力，在思想和社会经验相联结之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论文体现出的宏大构想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仍是一种挑战。

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科学并不想接受这种挑战。曼海姆的同时代中最有影响的那些人，尤其是那些英美大学中的阅听人，受到了自然科学的诱惑，他们（错误地）认为社会科学应将基础建立于安全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之上。从此视角出发，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就不应再关注有效性问题，甚至不应关注意义问题。在二十世纪末，学术的风尚几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弯，那些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弄潮儿的（文化、社会、文学和政治）理论家欲图与过去决裂，不再坚持认为意义的历史性是不可化约的。这就产生了自相矛盾的效果，对曼海姆的评价也几乎毫无停顿地发生了转变，以前人们认为他“天真地、不合时宜地向相对主义投降”，现在则认为他“天真地、不合时宜地试图克服相对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曼海姆曾“特许”数学或自然科学并不与社会位置发生关系，但晚近知识社会学中最活跃的分支恰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up>[2]</sup>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北美和西欧的社会文化理论的风尚也发生了改变，其发

[1] 尽管这两篇手稿很有价值，但我们只能从曼海姆身后出版的英译本中了解它们，而且此译本的编者认为有必要“反思原稿”，参见阿道夫·洛韦（Adolph Lowe）在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1956）书中写的编者说明，第vi页。

[2] 参见斯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无所不在：科学知识社会学》（‘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Palo Alto, CA: 1995, pp. 289-321）。

展的方向有可能使曼海姆的宽泛的研究理路得以复活,尽管很少有人直接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指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篇评论写道:“各种学科的汇流——不仅是社会学,而且还包括哲学、人类学、文学评论、思想史、科学、艺术——有利于曼海姆的研究设想的复活。”〔1〕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一趋势依然强劲有力、影响巨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信息爆炸更强化了曼海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我推荐徐彬先生编选的此文集,希望它能使更多的思想者参与到曼海姆所激发的对话中来。

〔1〕 亨里卡·库克里克(Henrika Kuklick):《知识社会学:回顾与展望》(‘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Palo Alto, CA: 1983, pp. 287)。

#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 中译本序

## 第一部 知识社会学问题

- 问题的位系 1
- 理论立场 14
- 现代现象学立场的知识社会学(马克斯·舍勒) 22
- 动态立场的知识社会学 50

## 第二部 代问题

- 现今的问题状况 65
- 社会学视角中的代问题 76

**第三部 作为文化现象的竞争**

**第四部 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

- 社会群体的自我发现 161
- 知识阶层的社会学理论纲要 170
- 如何确定社会群体 175
- 知识阶层的类型 179
- 当代知识分子 182
- 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 188
- 知识分子的自然史 222
- 知识阶层的当代状况 228

**第五部 精神社会学导论**

- 对问题的初步思考 246
- 错误和正确的历史和社会概念 256
- 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精神概念 288
- 精神社会学概要 310
- 概要:作为研究领域的精神社会学 316

若干说明

323

人名索引

325

主题索引

330

译后记

337

目

录

## 第一部

# 知识社会学问题

### 一、问题的位系<sup>(1)</sup>

位系(constellation)一词来自占星术,指的是在一个人出生时星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研究这种相互关系的人们相信初生婴儿的命运是由“星座”(constellation)决定的。广义的“位系”一词指的是在特定时刻特定因素的特定结合方式,如果我们有理由假定,各种因素的并存导致了我们所感兴趣的某个因素形态的构成,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此结合方式进行研究。占星术对我们来说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或现实性,但位系一词却被我们从占星术描述性和理论性的语境中提炼出来,结合进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语境中去,如今该词已成为我们用以解释世界与人类精神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在其他领域中,也有一些基本范畴从原本过时的语境中脱离出来,用诸新的理论语境。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类范畴的研究很少,它们也被方法论的研究所忽略,但我们仍可以说,正是这类因素为我们理解世界、把握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中的现



象提供了一系列最有价值的工具。某些特定的历史哲学概念（如“天命”[fate]）也表现出了经久不衰的丰富内容，尽管其形式处于不断的变迁中，但这正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

从原有语境中分离出来的“位系”范畴在一个领域内尤其富有成果，我们在此领域中仍能运用真正的形而上学直观：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自然是默然无声、缺乏意义的，但我们在研究历史和历史心理时却认为，我们能理解基本力量之间的互动，能阐明构造现实的基本趋势，并能超越于日常事件的表象之上。在此方面的研究中，即使是专业学者也成了形而上学家——不论他是否愿意，因为他必将突破孤立事件之间个别的因果关系，并要始终探寻使各种事件得以产生的“动力”。显而易见，该类型的形而上学是惟一适合我们研究的理论形式，也与过去所有的形而上学不同——就像我们使用的“位系”一词的含义与该词在占星术中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

关于人类思想的知识本身也是按历史顺序发展的，我们在此发展顺序中提出“位系”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知识的下一步发展不仅由各种理论问题的发展程度所决定，而且也由理论的外在因素的位系所决定，这就有可能在某个时刻预测某个问题是否能被解决。尤其在文化科学中，我们相信并非每一问题都能在每一种历史环境中产生——先不论该问题是否能解决，问题的产生与消失总是遵循着某种确定的节奏。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因素，一个问题引出另一问题常常是纯粹逻辑上的需要，如果出现中断，只能归咎于难题得不到解决，但文化科学的历史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表现出这种“内在的”发展过程。在更多时候，某些问题会突然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都由原有思想的发展史中的任何内在因素预测